

2011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3-0192-1

I.①北… II.①郑…②沈…③潘… III.①社会学-文集  
IV.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1316号

责任编辑: 杜海燕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3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3.5印张 370千字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2011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 前言一

在我的理想中,在本科生阶段,社会学学生应该具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意识,而不是仅仅提出自己的观点。发表看法,这应该是高中阶段的任务。那时候,对于社会现象,谁没有自己的看法呢?只不过老师和家长不让你发表或者充耳不闻而已。

到了硕士的阶段,社会学就需要讲方法了。看到一篇文章,听到一种说法,我们不仅必须判断一下它有多少证据,还需要琢磨一下:这些证据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这种方法适合于获得这样的证据吗?以宏观的思辨为例,如果你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提出某些看法,却仅仅是依据大众传媒中的事例,那么这种获得证据的方法就很值得怀疑了。难道你不知道中国是“宣传有纪律”的吗?

因此,所谓“研究”,其实就是使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取更加充分的证据,然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谓“研究生”就是只有这样研究才能“生”;所谓“硕士”就是只有这样来“说”才能成为“是”,才算得上一个“士”。

可是在我任教 27 年来,很少见到研究生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自己的硕士论文。绝大多数同学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完全是功利的考虑。还有一些学生则基本上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许多采用定性调查方法的同学,在其论文里,甚至在其脑海中,只字不提自己为什么要进行定性调查而不是问卷调查,为什么定性调查就是研究这问题的最佳选择。通过私下交谈我才知道,原来许多同学认为“定性调查更容易做”或者“我没有条件做问卷调查”或者“我不会做统计”或者“只讲故事别人挑不出错”等等,等等。

结果,在我看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定性调查的硕士论文,实际上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更合适,解释力更强。尤其是那些动辄就访谈数十个对象的、采用“求同法”来归纳共性的、以调查对象的比例分布来说明问题的、访谈提纲设计成开放式问卷的所谓“定性调查”,其实还不如去好好设计一个问卷,做一个合格的定量调查。

反之,为数不多的涉及问卷调查的硕士论文,基本上是初级统计的成果,既没有方法论的阐述,也没有问卷设计的反思,更没有讨论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变成了“就数据说数据”的“玩儿统计”。我就纳闷了,如是,这些学生考统计学专业好不好?我们玩儿得过人家吗?往重里说,那还要我们社会学干什么?炒着吃?

当然,这是师之情。据我所知,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要么变成了统计学的初级应用,要么变成了社会思想的哲学思辨。可怜那些基本上没有领导过任何社会调查的或者仅仅做过简单劳动力的调查员的本科毕业生们,如何能够在短短一两年的课程中,学习和实习任何一种调查方法呢?如何能够领悟到定性调查与问卷调查其实是两种世界观呢?如何把方法论的意识贯彻到自己以后的人生中呢?

行文到此,我突然诚恐诚惶了。“实证主义”的大帽子似乎扑面而来。其实,在我的理解中,所谓“证据”绝不仅仅是定量数据或者访谈资料,还包括社会洞察或者人生感悟;否则,从孔夫子到鲁迅岂不都成了痴人说梦?所谓“方法”也绝不仅仅是合适的实地操作手段,还包括最佳的思维逻辑与观察视角;否则,发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怎么会搞出“大跃进”来呢?

感悟与了解,了解与感悟,这在传统的简单社会中本来就是人生如斯,人人如此,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可是现代化来了,社会分工了,于是在我所知的社会学硕士培养过程中,不仅缺乏了操作培训,也缺乏了领悟培养。尤其要命的是,这两者往往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曾经有一位社会洞察力远远超过其实际年龄的人大硕士生,三年之后再见到我,张口闭口的学术规范,思若死水,味同嚼蜡。也曾经有一位在统计方面帮了我大忙的硕士生,后来居然成为某部门的

辩护士，不知人间疾苦，瞪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是人啊，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啊。没有洞见，方法何益？没有方法，洞见何依？我们社会学不仅需要与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找与确立我们独特的学科位置，而且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重申我们与人文艺术之间的血缘关系。舍此，我们将被经济学吞掉（例如资本、利益这类名词在社会学中的滥用），将被统计学鄙视（恭请社会学家给统计学专业杂志投稿试试），将被哲学淹没（我们所崇拜的“巨匠”有几个不是哲学家），将被大众传媒抛弃（时至今日也没有人回答“好的新闻报道与定性调查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10年前的老问题）。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想，可是，行将就木的我，直勾勾地瞪着刚刚跃上考研龙门的你！

潘绥铭

## 前言二

阅读文集集中的论文时有个体会，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一篇好论文，首先必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好论文是由好问题来导引的。什么叫做好问题呢？在我看来，好问题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要能提出一个好的经验问题，即从我们周遭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和发现那些值得发问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变动、解体与重建，折射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让我们询问数不胜数的问题，古人有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意正在于告诫我们要仔细观察周遭的宏观和微观世界。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就必能找到好的即值得发问的经验问题。

但是，我们是社会学工作者而不是新闻记者，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发现和描写那些有趣的或重要的经验现象。我们还必须对此作出理论的解释，而这就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要同时能够提出一个好的理论问题。好的理论问题首先来自相关的理论系统本身，需要经过系统的爬梳过程才能形成。与此同时，好的理论问题往往产生于理论本身与现实的碰撞，多半表现为理论遭遇经验现实后形成的悖论——当现成的理论模式不能直接解释和说明经验问题时，理论创新的机缘就出现了。

所以，在我看来，好问题就是好的经验问题和好的理论问题相结合，而能否提出好问题乃是一篇论文成败的关键。在一篇短短三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我们或许不见得能够尽善尽美地解决问题，但能够提出一个好问题就已经成功了一多半。因为一个好问题必是有后代的，它能够开创一个论域，值得后人反复进入，认真研讨。

上述文字似乎非常抽象，但是在一篇短序中也只能如此了。如果读者们认为我说的尚属合理，那就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读一读我们选出的论文，看一看这些论文是怎么提问题的，它们提出的是否能够被称为好问题。

沈 原



## 前言三

特别高兴，潘、沈两位老师写了两篇前言，当然也算鄙人绑架有功。

他们到了今天这把年纪，学问做到而今这步田地，端出的当然不是勾兑物，也不是当年的高粱酒，而是陈年佳酿。

指导论文两大路径，批改姑且不算。其一，阐明路数；其二，提供样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写论文的道数可以说一车话。我很同意，且一直在传播沈老师的那句口头禅：讲个故事说个理儿。其精妙之处在于将论文的成功放在了两个支点上：将一个复杂的勾当说明白，且讲出个理儿，若只放在前一支点上怕是成了新闻稿，若只放在后一支点上恐同学们理论素养不逮，所以我们不提倡写纯理论的论文。我虽高度认同沈老师的口头禅，但若再往细说，我们似乎也小有一点分歧，就是他说的“理儿”比我说的“理儿”要高一筹。他的“理儿”就是《理论》的京味称谓。我则觉得，“理儿”还可作“事理”解。对硕士论文，我更愿意提倡，讲个故事，说出事理，即说出这现象、这勾当何以如此，当事人为什么着了道。我不敢奢望硕士生们能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抽绎出“理论”。若我们如此提倡，压力之下，他们常常贴金包银，结果理论不是深刻地解释故事，而是生硬地包装故事。今日，此种风格已是颇成气候的一种八股。沈老师说的一点不错。只是我觉得，为将就同学们的水平，更现实可行的要求有可能是说出一番事理，而不是理论。

接着说指导论文的第二路径，提供样板。好的样板当然不缺乏，但一等的论文同学们还学不来，眼下保持在“心向往之”的状态就挺

好。同龄人的好文章尚有疵瑕,但对他们有特殊的功效。照着老虎,你难画出像样的老虎。照着齐白石老先生大写意的对虾、菜蔬等等,他们还是画不来。但是无论是照着真实的还是写生的葫芦,他们都可以画出像模像样的一个“瓢”来。

拿出可以效仿的样板是指导论文的路径之一,但是拿出来并不容易,要寻觅挑选。这也正是本文集的目的所在。这已经是第九集了。不尽人意之处肯定大大的有,有我们的原因,也有三系全体师生的责任,社会风气的因素。我们自信,遗漏掉的更好的论文应该不多。

我们遭逢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假冒伪劣,风行社会;本分敬业,已成稀缺。走过这段低谷,或许会有学术繁荣的到来。微观而言,我们只能维护自己的小环境,拼力使它不被社会“尽数”吞噬,吞噬掉大部分似乎在所难免。宏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立于学术高峰的才能与幸运,传递香火是卑微似我者高尚的天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郑也夫

# 目 录

前言一 .....	潘绥铭	I
前言二 .....	沈 原	IV
前言三 .....	郑也夫	VI
家庭即工厂:河北北镇乡村工业化考察 .....	陈秋虹	1
中德大学生择偶标准和婚姻观念的比较研究 .....	黄柯劼	55
媒体在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中的角色 .....	孔春霞	107
少年基金项目运作的个案研究 .....	汪 芸	159
农民上楼过程中的家庭财产关系研究 .....	徐聪颖	214
潞河中学的新疆班 .....	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	261
策略与话语:纠纷解决中的弱者 .....	张 晶	315
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关系的实证分析 .....	周 彬	364
附录:三系 2011 年硕士论文题目汇总 .....		415

# 家庭即工厂： 河北北镇乡村工业化考察

陈秋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008 级  
指导教师 沈 原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一、现象：院落中的工厂

随着乡村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在一些传统农业社区里逐渐崛起了规模庞大、网络密集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大多是由从事相关及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大量集中于某些邻近镇区的村社中，形成了“一乡一品”甚至“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河北北镇位于冀中平原中部，地处京、津、保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它是以箱包为支柱产业的乡村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

在 2008 年的金秋时节，笔者走进了北镇。车还未进入镇中心，就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路上随时都有人拦下公交车扔上一大摞箱包，告诉司机把货带到哪里。箱包大厅附近更是人头攒动，整个小城都弥漫着浓郁的商业气息。真正给笔者带来震撼的是来到 XY 村，随意推门进入一家农户，都能看到北方农村的小院里到处堆满了已经打包完成准备发出的成品箱包和各种用于生产箱包的辅料。在这个不大的院落里，似乎每一个房间都物尽其用，工作间、工人寝室甚至是最为私密的老板卧房也都摆放着各种生产工具以及箱包成品，每个房间里都充斥着胶水的味道。屋内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作场

景,年轻的女工被分为几组,她们专注地完成自己身边的工作,满地都是制作箱包剩下的边角料。老板和老板娘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前来送货取货的人也络绎不绝,有时还能看到耄耋老人和稚气孩童也在帮忙做着辅助性的工作。总之,整个村庄呈现出“家家机器响,户户搞加工”的场面,热闹非凡。

## 二、工业化与家庭的关系

川流不息的车辆,成堆的箱包,繁忙的箱包从业者,还有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交织于作者眼前,一时间眼花缭乱。然而,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发现支撑起整个箱包产业的是散落于村落当中,嵌入在家庭之中的工厂。

北镇家庭工厂产生之初正是华北农村社会中大量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阶段,这些从事箱包生产的核心家庭比分家前的扩展家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家庭的经济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甚至逐渐在北镇这个改革开放前地处农业区域,既非皮革原料产地也无产业传统,还缺乏便捷交通的小镇缔造出华北最大的箱包市场。(沈原,2007:95)可以说,北镇家庭工厂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中经济发展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模式——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家庭规模缩小、经济功能弱化。

那么,作为箱包产业主体的家庭工厂产生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工厂与社会结构发生怎样的互动,发展的逻辑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本文希望在社会结构的视角下考察作为践行华北乡村工业特殊形式的家庭工厂的产生、发展与经营逻辑。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具有多个层面的含义,研究者一般根据自己分析的需要而对其作出相应的界定。尽管如此,其基本内涵还是相对确定的,即处于社会体系当中相对稳定的各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方式。“大体而言,社会结构在宏观层面上意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如何作用于社会,在中观层面则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社会的方式,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分析个体之间互动的关系模式。”(谭同学,2010:3)本文所指的

社会结构主要落在了家庭的维度上,探讨的是乡村工业化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 第二章 田野概况与研究方法

### 一、北镇作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典型案例

北镇位于冀中平原中部,地处京、津、保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北距北京 102 公里,东至天津 108 公里,南到保定 62 公里。北镇下辖 33 个村街,全镇 54.5 平方公里,镇区面积 13 平方公里。

北镇箱包产业的发展过程既有必然因素的作用,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动。从必然因素看,首先,北镇拥有手工业生产的传统,而早期箱包的生产制作并不需要很强的工业技术水平和太多的资金投入,家庭就可以开展生产。其次,北镇人开始生产座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内生性需求。北镇箱包产业发端于最混乱也最困难的年代,一向熟于经商而淡于农耕的北镇人,好不容易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两年“四清”的严寒,可是又来了“文革”。(平白,2008:93)整个十年动乱期间,北镇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受到严重抑制,在个别阶段几乎完全停止。历史上曾创造过无穷财富的北镇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两个一八”的现实:一角八分的工值和一两八钱的口粮。因此,生活窘迫的农民们必然会努力地寻找机会解决生存危机。

北镇箱包业的发展还需要作为关键事件与关键人物的偶然因素助力。高桥,一个地处北镇河畔的普通乡村。这片土地却并不肥沃,人多地少的村情,只靠种地显然很难满足温饱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高桥大队是当时北镇公社工值最低的一个大队。全大队共有十六个小队,每个小队的工值开八分钱,有的小队还不足八分。为了生存,高桥村的各生产小队开始搞起副业,搞柳编、磨豆腐、开油坊,虽略有收入,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事情的转机发生在 1971 年的一天,张国卿,时任高桥第八生产队队长,站在路旁跟亲家聊天,偶

遇一骑车的过路人问路，看那人自行车座套与众不同，人造革做的，新颖别致，便随口问了价钱，又仔细看了看那座套的做工、用料。两亲家讨论：说不定这倒是个赚钱的道儿。如果自己下料，手工制作，成本会很低，即便比眼下市面价再便宜点，也有钱可赚。回去后，张国卿认真地分析了一下，座套工艺简单，又有市场需求，也不需要太多启动资金，完全有可行性。在得到了队委们的支持后，张国卿开始四处筹集购料款，他拿出了准备给闺女结婚买手表的一百多块钱，又跟社员们借了一部分，凑足两百多元，然后和张二霞带着筹措的钱，到北京大栅栏劝业场买回两捆过时的黑色人造革残次品。原料买回后，张国卿即刻找来李志萍等队里公认的巧妇试做。大家将座套的样品拆开来，比照着剪裁，这样，第一个人造革车座套在高桥八队诞生了。到北镇供销社小试牛刀后，发现座套的销路很不错。

在 GQ 大队第八生产大队书记和会计的带领下，全队人都开始尝试做自行车座套。1971 年冬天，年终决算时，八队光靠做座套就大大地赚了一笔，年终分红人均一百元至二百元。八队人尝到了商品经济的丰硕果实。从此，开始了向多层次、多领域发展的经济步伐。1972 年春天，他们认识到光靠生产自行车座套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不能只在单一的车座套上讨生活，必须有更新更好的产品上市，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八队的一个社员在北京看到有人提着一种两根带的书包，于是马上买了回来，拆开研究仿制。就这样，八队开启了箱包生产。慢慢地，八队有了自己的缝纫机，开始买了四台供有技术、手艺好的社员使用。接着，缝纫机由四台变成了八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形势下，全村几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搞起了箱包生产。巨大的市场和可观的利润又吸引了北镇周边广大农民纷纷加入箱包加工生产行列，于是家家户户都做起了箱包，箱包产业迅速成长为北镇的支柱产业。产品一多，周边地区的市场就消化不掉了，这时产品的销售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出路。于是，在那个年代，北镇人手提肩扛，上京下卫，跑遍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形成了一支几千人的营销大军，他们在把北镇箱包送出去的同时也招来了越来越多的进货商。

长期的发展和积淀给北镇带来了无限商机,1994年5月8日,箱包交易大厅正式兴建,它标志着北镇箱包沿街为市的历史告终。到1997年,北镇已经形成了箱包交易市场、皮革专业市场、五金配件市场、箱包辅料市场、白芙蓉小商品市场、玩具市场、服装市场、鞋帽市场、针织市场、联运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格局。伴随着北镇建设的加快,箱包市场的面积不断扩大,正在建设的有26层的银领国际箱包大厦和10万平方米的国际箱包城西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镇拥有5000多家门店,3万多个经营摊位,规模企业300多家,加工企业3000多家,个体加工户近万家,行业相关经营者已达5.6万,北镇目前年产箱包5亿只,在全国所占的份额由原来的第5位到现在稳居第2位。北镇当地企业注册商标已近1300个,箱包产品拥有3个真皮标志、9个省级品牌,吸引了7000多个品牌产品,在北镇开设了3000多家直销店、专营店,形成了从原辅料生产到成品销售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但是在这个庞大的企业群中,产值过千万的仅有18家,最大的加工企业用工人数也不到200人,全部属于中小企业。箱包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5个市县近百万农民致富,使北镇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截至2008年底,北镇全镇社会总产值达到107.5亿元,市场成交额258亿元,财政收入1.5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702元。<sup>①</sup>

## 二、为何选择北镇

对于乡村工业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南方的浙江、广东等省份,这里是最早参与改革开放的地区,私营经济尤其活跃,因此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本文尝试将目光锁定在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北镇,因为与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相比,北镇的乡村工业生产组织在规模、经营和管理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

首先,长三角及珠三角的工厂规模通常较大,一两千人的大厂比比皆是,而北镇的大部分工厂规模较小,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工厂不过

---

<sup>①</sup> 资料来源:2009年白沟镇政府工作报告。



数十家,其余的大多是一些散落在村庄内,嵌入于家庭中的加工户;其次,从经营方式看,珠三角及长三角的乡镇工业一般都在发展过程中借助于家族力量或者外力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以图在竞争中获取规模效应,然而以北镇为代表的华北乡村工业生产组织一般以家庭自有资金为基础,发展过程中也很少借助于家族或者外来资本以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而是以“家家搞生产,户户搞加工”为自身的经营特色。再次,从管理方式上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规模较大,有着等级森严的科层管理体制,而北镇箱包业吸纳的大多是十几岁刚从学校毕业或辍学甚至还没有成年的少男少女,他们很多是直接家里被老板接到了工厂,老板甚至还要履行工人父母所托付的“监护”职责,因此,这种“家庭生产共同体”与工厂有着较大的区别。由此可见,北镇箱包家庭工厂与既有研究关注较多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乡村工业生产组织存在着较大差异,是华北乡村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 三、家户工厂概念的界定

对于北镇箱包生产主体的界定,童根兴(2005)提出了“家户工厂”的概念,他认为北镇箱包家庭工厂是“由家庭成员参与箱包生产、管理以及销售到具有独立的大规模厂房和专业管理人员的现代产业”的连续谱。符裕(2007)曾经对北镇的箱包工厂作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独立厂房和专业管理人员的规模工厂,在管理体制、运作方式等方面也与家庭工厂有着高度的相似,差别仅在于规模工厂拥有比村落中的小型工厂更大的生产空间和更多的生产工具。闻翔(2007)对“家户工厂”的界定则涵盖了村落中的家庭工厂与镇区上的规模工厂这两部分,与童根兴的定义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本文认为要对北镇以家庭为依托开展箱包生产的单位进行定义,还需要厘清其与家族企业的区别:首先,在家族企业中,老板所在的家与工厂所在的空间往往是区分开的。而北镇的的箱包生产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因而这个空间中既有工厂劳动空间所具有的公